

宋朝如何开启“过冬模式”

宋代的农历十月，是一个暖心暖胃的时节。十月初一，朝廷为全国人民按下过冬的“启动键”，皇帝会向文武官员、禁军将士赏赐冬装，一场隆重而盛大的过冬活动开始全面铺开。

宋朝“采暖季”和今天基本一致

在宋代，无论皇官还是民间都会提前为过冬做准备。农历十月初一，民间要举行一些过冬的象征性活动。北方天寒，以此日始用炉火，称“开炉”，即在此日安装火炉、烟筒并试烧，以保证顺利取暖。“暖炉会”始于唐代，围炉夜话讲究雅致，小酒段子边喝边聊，十分惬意。

宋代从十月初一开始，官员们上朝就觉得比外面暖和多了，大殿内设置有火炉，已经开始取暖。每天皇帝主持完朝会后，还会赐给大臣热茶和热酒驱寒，一直持续到正月结束。如果遇到特别寒冷的雪天，还会在廊房里额外赏赐酒内。京城的寺庙也会用信徒布施的柴发生起火炉，举行隆重的“开炉”仪式，并举办斋会，僧侣信众聚在一起，既暖身又礼佛。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六中记载，“有司进暖炉炭，太庙享新，以告冬朔。诸大刹寺院，设开炉斋供”。即官府向宫中进献暖炉所用的木炭或石炭；民间都置备酒水，举办暖炉会；太庙的祭品要换成新的，用来祭告冬天的到来；各个规模较大的佛教寺院，也开始生火炉以满足那些供斋的富贵人家的需要。

此外，富贵人家的暖阁低垂着绣幕。老幼团聚暖阁，浅斟低唱，以顺应开炉之节序。暖阁又称火阁，就是在大房间打造的一个小隔间，大约四五平方米，能充分照进阳光，类似阳台，可以在里面读书品茗焚香冥想。

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的“开炉”一节中，说南宋时皇室“自此御炉日设火，至明年二月朔止”。普通百姓家也在十月“旦日开炉家宴”。南宋冬季开始取暖的开炉节，是沿袭北宋的习俗。从《武林旧事》等文献中可知宋代的采暖时间，是从农历十月初一至二月初一，共四个月，与今天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采暖季基本一致。如果春天来得晚，偶尔会特许延长五天，但绝不会超过这个期限。

百姓无炭取暖 权贵人家却有乐器专炭炭

无论是木炭还是石炭，两者都是东京城内必需的过冬物资。先说木炭，在石炭没有广泛开采使用之前，木炭是主要的燃料。古代中国，无论是兴建民宅与宫殿，还是冶炼铁中的熊熊烈火，乃至寻常人家的灶台与澡堂，都一直持续消耗着宝贵的林木资源。

到北宋中叶，曾经的青山已不堪重负之态。为了维持百万人口的京师日常所用薪炭的供给，通过水路，形成了以东京城为圆心，半径长达千里的运输网。河北、河南太行山区的木柴，通过黄河转汴河入京。宋英宗治平二年，当时漕运到京师的木柴达1713万斤，木炭100万秤，每秤15斤，即1500万斤。

皇宫所需木炭格外讲究，到了南宋时期，宋高宗绍兴四年，两浙转运司撤令婺州买木炭，以充做“御炉”之用，而所买的木炭必须是“胡桃文、鹑鸽色”。

当普通老百姓在冬天无炭取暖之时，权贵人家的乐器竟有专供“笙炭”。周密《齐东野语》中记载，吴郡王府（宋高宗吴后之弟吴益的府邸）建有一座七开间的“翠堂”，专门用于教导歌舞姬女学习声乐技艺。那里的乐师伶人，都是皇家教坊中的



《雪渔图卷》中两个孩童躲在船舱中烤炭炉 (局部 宋)

顶尖高手，单单笙这种乐器，就有20余人演奏。从十月初到二月底，每日供给五十斤烘笙专用的木炭，以锦缎熏笼托着笙器，再用四和香缓缓熏焙。因为笙簧是用高丽铜制作，簧片涂绿蜡，唯有烘得温热，音色才能纯正清亮，所以必须经过焙熏方能使用。

宋朝人取暖 烧石炭还是木炭

大中祥符五年，京城连降大雪，严寒刺骨，炭商坐地起价，木炭售价高达每秤二百文。十二月六日，宋真宗下令由三司调拨四十万秤木炭，以市场价格的一半卖给贫民。

朝廷还派遣十六名使臣分设售炭场，并命两位内侍官员总管事务。此后贫民争相抢购，竟至发生踩踏致死事件，遂命都巡检张旻派遣官兵维持秩序，对死者家属发放抚恤金，无亲属者由官府安葬。同时诏令三司常备五百七十万秤炭储，仿效常平仓制度，遇炭价飞涨时即平价发售。

天禧元年十二月，京城大雪盈尺，官方的卖炭市场原本在凌晨五更时分开市，并且限定了每人购买木炭必须15斤起步。贫苦百姓为购买物资匆忙赶路，在寒风中衣衫单薄、步履蹒跚，有人因钱资不足往往空跑一趟。朝廷得知这种情况后便颁布诏令：凡是购买一斤以上的民众都可以购买，同时将交易时间调整到辰时（对应现代时间是7-9点）。

北宋中期开始的极寒天气，京师储备的木炭一遇到大雪就提襟见肘。这个时候，石炭作为新能源开始广泛使用了。熙宁元年，宋神宗下诏“石炭自怀至京不征”，从怀州（今河南省焦作市）运输到京城的石炭，不征税。一方面是木炭价格需大于供，价格扶摇上升，一方面是石炭以热值高、便于储存等优点开始普及。

其实早在大中祥符二年十月，宋真宗就曾下诏：“如闻并州民鬻石炭者，每驮抽税十斤，自今除之。”而在此之前，石炭“每驮抽税十斤”，一驮为一百斤，石炭抽税是百分之十。就算是在局部地区，政府免除石炭税，还是能够促进石炭流通的。

到了熙宁七年五月，江陵府江陵县尉陈康民上书说：“相度南京、宿、亳收市窑柴衙前合行减罢。勘会在京窑务，所有柴数，于三年内取一年最多数，增成六十万束，仍与石炭兼用。”这个时候，商户、手工业者、百姓使用燃料的数据显示，石炭基本上与柴炭持平。

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了汴河南岸和北岸各有十座石炭场。京师内还有内、外柴炭库，主要是储备薪炭，保障官城及宿卫班直军士使用薪炭。在寒冷的冬天，宋朝的子民，取暖主要依靠炭炉、暖阁等，无论是用石炭还是木炭，都要小心一氧化碳。

授衣节 朝廷给臣子们“送温暖”

九月天气转凉，应为即将到来的严冬添置衣裳，因此九月被称为“授衣时节”。



《晓雪山行图》中驮炭的驴子 (南宋 马远)

大唐天宝二年八月二日，唐玄宗颁布《九月荐衣陵寝制》诏令：“禋祀者，所以展诚敬之心；荐新者，所以申雨露之恩。是知先王制礼，盖缘情而感时……自流火届期，商风改律，载深追远，感物增怀。且诗著授衣，令存休浣，在于臣子，犹及恩私，岂可园陵，未标典式。自今以后，每至九月一日，荐衣于陵寝，贻范千载，庶展孝思。”唐玄宗的这一诏令，以国家行政命令的方式固定九月初一为拜墓送衣的日子。

在北方，九月正是农忙秋种的时节，到了十月才刚步入初冬，所以在九月送衣就稍微有些早，到了宋代，这一习俗被推移到十月初一。

北宋后期，每年十月三日（南渡后改在十月五日），京城中的士庶民都出城祭祀祖先的坟墓。宫中派出车马，前往道者院祭奠，并往西京朝谒陵寝。皇族的车马也前往诸陵祭祀，如寒食节一样。

十月初一也是扫墓的日子，人们会去祭拜祖先，感受深秋的霜露，表达对故去亲人的怀念。南宋《武林旧事》记载，这一天，“都人亦出郊拜墓，用绣球楮衣之类。”出郊拜墓的人，在墓前烧纸衣，以表给逝者“授衣”之意。

有宋一朝，“授衣”除了烧衣之外，还另有一层意思。十月初一，朝廷就开始给臣子们送温暖了。《梦粱录》中说，在杭州，“十月孟冬……朔日，朝家赐宰执以下锦，名曰‘授衣’。”但是据北宋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记载，这项制度在建国初年并不完善，冬天只赏赐单衣，赵匡胤发现后很惊讶，说：“这都冬天了怎么还赐单衣？”于是下令改为赏赐袂（jiá）衣。从此，官员们的冬季制服才变成了更保暖的袂服。

“授衣”是按级别的，禁卫军以上的高级将校，都会获赠华丽的锦袍，并且要当场穿上谢恩。皇帝身边的近侍、皇亲宗室，赏赐的则是锦缎，用来镶在官服的领口和袖口上作装饰。镇守边疆的元帅、漕运长官等封疆大吏，同样会得到锦袍赏赐。宗室子弟的待遇最好，他们每年能在春天、冬天、端午节和十月初一收到四次新衣，被称为“四季衣”。

淳化四年，一天京城天降大雪，气温骤降，宋太宗便派官员给那些孤苦伶仃的老人和穷苦百姓送钱、米和取暖用的木炭。若天气寒冷，皇帝还会特赐诸军班薪炭。元祐元年，宋哲宗开始给各军发“薪炭钱”。到了南宋，雪寒之时，薪炭钱每年依例“特支”一次，成为军队将士固定的补贴之一。此外，驻守在邠州、宁州、环州、庆州这些沿边地区的将士，因生火做饭和打水非常困难，每两个月还有一项“薪水钱”的补贴，主要是用于日常柴炭和饮用水的开支。如今很多地方管工资也叫“薪水”，基本就是来源于此。

在十月，无论是北方的暖炉还是南方的开炉，还是朝廷的“授衣”，都预示着进入了“过冬模式”，即将用温暖抵御来临的寒冬。

古代的“学位服”为何是青色

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”这流传千年的诗句，不仅是对贤才的思慕，也勾勒出中国古代学子服饰的一抹清雅身影。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中，学子们其实一直拥有属于自己身份的“学位服”，那便是“青衿”。

“青衿”一词，最早见于《诗经·郑风·子衿》。《毛传》释其为“青领”，指的是衣领的颜色与样式。汉代学者进一步解释，“衿”即“交领”，是古代衣襟交叠于胸前的形制。因此，“青衿”的本义，正是先秦学子所穿青色交领之衣。

为何偏偏是“青色”？这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意涵。在传统五行观念中，五色与五行相配，青色对应东方与木行，象征草木初生、万物萌发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青”为“从物生时色”，恰与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的教育理念相呼应。身着青衿的学子，被视为未来的“宰相根苗”与“国家栋梁”，青色承载的，是师长家国的期许与栽培之意。

那么，这种“青衿”究竟是何形制？这便需追溯至先秦至两汉时期的“深衣”。早期纺织技术有限，布幅较窄，为制作长衣，古人将上衣与下裳相连，形成“被体深邃”的深衣制，兼具礼仪与实用。“裾”指衣袍下摆，下摆平直者为“直裾”，弯曲盘绕者为“曲裾”。从出土文物看，如马山楚墓中的战国直裾袍，既有宽博雍容的款式，也有收窄合体、便于行动的形制。后者更贴合“青衿”作为日常学子服饰的轻便形象。

深衣所蕴含的典雅庄重，对中国文人审美影响深远，成为儒家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后世历代儒者，如宋之朱熹、明之先贤，皆致力于复原与传承深衣之制。朱熹所复原的“朱子深衣”，采用“对穿交领”结构，平铺时为上襟，穿着时交叠成领，形制古朴庄重。明代则在承袭古意的基础上发展出“续衽交领”，平铺亦呈交领形态，更显方正严谨。此外，为简化制作，明代还衍生出通裁结构的“道服”，虽制作工艺不同，其礼仪地位与深衣相类。

在明代，深衣与道服并非日常随意穿着的服饰，其礼仪层级极高，常出现于极为郑重的场合——例如科举放榜之日。在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社会，科举放榜实为学子生涯中至关重要的“毕业典礼”，中试者“上岸”，落第者再战，如归有光这般屡试不第直至暮年者，亦不乏其人。在此人生关键时刻，深衣与道服便充当了他们的“毕业礼服”。

与深衣、道服的隆重相对，“襕衫”则是学子平日所穿的“制服”或便服。宋代以圆领袍为官员常服，学子作为“准官员”，其襕衫亦为圆领，形制近似官服，但多以白色为主，称“白襕衫”，衫下施一横襕，既延续“青衿”遗意，亦象征深衣之制，标示其“白衣”（未仕者）身份。至明代，襕衫制度得以延续，但取消横襕，改以宽阔边缘为饰，且颜色统一为蓝色，故又称“蓝衫”。

那么，那些在“大登科”中脱颖而出、高中进士的“天之骄子”，在人生最荣耀的时刻又作何装扮呢？自宋代起，新科进士“簪花”之礼便被正式载入《舆服志》，谓之“簪戴”。所用之花以罗、绢制成，颜色、式样皆有严格规定，君臣同簪，盛况空前。进士于此日可脱去白襕衫，换着低品级的绿色官服，谓之“脱白挂绿”，标志其身份由“民”至“官”的根本转变。即便一身装扮，既庄重，又添儒雅风流，在闻喜宴上亦不得不遵从“君赐不可违”的礼制，勉为其难簪花一枝，成为历史趣谈。

至明代，进士服饰更趋专门化，形成独特的“进士冠服”：身着蓝色罗袍（可视为襕衫的升级），头戴饰有展脚、可加簪花的“进士巾”。这一身装扮，既显庄重，又添儒雅风流，成为科举功名的视觉象征。

从先秦的“青青子衿”，到宋明的“深衣道服”“白襕蓝衫”，再到进士的“簪花挂绿”，中国传统学子服饰不仅是一部绵延千年的服饰演变史，更是一部承载着教育理念、科举文化、礼仪制度与身份认同的生动画卷。它们以其独特的色彩、形制与礼俗，默默诉说着古代学子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求索之路与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人生理想。

本报综合消息

本报综合消息



宋徽宗摹本《捣练图》中的炭炉 (局部 唐 张萱)